

印尼华人组织的历史演变及启示

Aimee Dawis 著¹ 李启辉 译²

(1. 印度尼西亚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传播系,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10510;

2.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印尼研究院, 福建福清 350300)

摘要: 关注华人组织的历史演变, 涵盖从前殖民时期成立的非正式小规模组织至 1998 年“五月风暴”后成立的印华百家姓协会和印尼华裔总会等大型社会组织, 着重阐述“五月风暴”后十年以来, 印尼华人社会组织的最新发展, 这期间, 苏哈托时期被禁止的华人社会组织得以恢复, 并产生了许多具有不同功能和形式的新组织, 带来华文和中华传统文化在印尼的复兴。研究发现, 尽管华人组织形式各异, 规模不一, 但都是以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以及以团结华人为目标而建立, 对印尼国家和民族具有较高的认同感和忠诚度。

关键词: 印尼; 华人组织; 华社; 华侨; 华人

中图分类号: K342

文献标志码: B

文章编号: 2097-2342(2024)06-0031-09

印尼是世界最大的群岛国家, 从最西端海港沙璜市至最东端伊里安查亚南部港口城市马老奇, 横跨上万个岛屿, 海岸线漫长, 数百个民族数百年来共同生活在这片区域中, 社会文化一直以丰富性和多样性而著称。

印尼华人在历史上多以商人、教育工作者、领导人、店主等身份活跃于社会各阶层, 为印尼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 是印尼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 早期移民漂洋过海、过番谋生初次踏足这片土地时, 面临语言不通, 人地生疏的境地。于是, 早期华人秉承“同舟共济”的朴素信念, 按照祖籍地和方言的不同, 成立了一些小型团体, 为这些早期的华人移民提供慰藉和指导。这些小型的非正式团体是印尼最早的华人组织。

为适应印尼国家和社会的不同需求, 经过数百年发展, 至 2013 年华人组织已形成数百个的规模。这些华人组织的领导者坚定地宣称他们忠于印尼, 并坦言他们生活在印尼, 与他

们“同舟共济”的不仅是华人, 还有数以亿计的印尼同胞。因此, 他们认为自己不但要为华人而竭尽所能, 也要为印尼国家的建设和民族的发展做出贡献。

本文论述的重点是华人的社会组织, 而非政治组织。自 1998 年“五月风暴”后, 学界有关华人组织的学术论文多聚焦于华人政党及其政治活动, 缺乏对社会团体组织的梳理。因此, 本文研究的重点为数量迅速增长和日渐壮大的印尼华人社会团体组织, 尤其是“五月风暴”后日益增长的印尼华人社会团体组织, 以为印尼华人组织的学术研究工作提供思路 and 参考。

一、华人组织在印尼的开端

早期从事舢板贸易的中国东南部沿海商人开始移居印尼。自公元 400 年起, 早在欧洲人东来之前, 中国人便来到了印尼最重要的岛屿、印尼经济和政治中心地区——爪哇岛。然而, 爪哇岛北部沿海地区第一个永久定居点的

收稿日期: 2024-10-18

作者简介: Aimee Dawis(1975—), 中文名俞文娟, 女, 祖籍福建, 纽约大学传媒学博士, 印度尼西亚大学传媒系讲师, 研究方向为印尼文化、人种学、后现代主义、媒介身份。

译者简介: 李启辉(1975—), 男, 福建福鼎人, 博士, 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中印尼关系、海外中国形象和汉语国际教育。

历史证据直至 13 世纪才出现。早期华人移民因对航运和出口资源感兴趣而倾向于选择爪哇岛沿海作为定居点,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三分之二的印尼华人居住在爪哇,其余则散居在苏门答腊、婆罗洲和巴布亚。

在 19 世纪 60 年代至 20 世纪 20 年代期间,来到印尼的中国人大多数被输送至种植园和矿山工作,为西方市场生产大宗商品。这些早期定居者多为文盲,未受过教育,地理知识匮乏。和大多数居住在东南亚其他地区的海外华人移民一样,他们不懂当地语言,人地两疏。为了更好地生存,华人中讲共同方言、拥有共同姓氏或祖籍地的乡邻之间抱团互助,逐渐形成了以共同传统和文化价值观为纽带,以“帮”或宗族组织为基础而结成的华人组织。这些组织为新移民提供生存所需的基本保障和支持,甚至提供陪伴和紧急援助,这对于印尼华人个人生存和社会福利至关重要。

在荷兰殖民时期(1602—1945),印尼华人被迫遵守具有强烈专制主义色彩的社会等级制度。位于社会等级制度顶层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成员(VOC),第二等级主要由荷兰东印度公司挑选的当地贵族精英组成。17 世纪末至 18 世纪,香料贸易愈发炙手可热。华人因勤劳刻苦、兢兢业业,被东印度公司当成重要的劳动力来源,东印度公司欲利用当地华人作为“殖民经济的特洛伊木马”,试图渗透本土土绅权贵阶层垄断的印尼贸易^{[1]57-80}。由于当时华人处于弱势地位,人数较少且不具备反抗东印度公司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华人同原住民世代和睦相处,较容易被原住民接纳,因此华人成为殖民者渗透印尼贸易的理想选择。

荷兰人利用华人来打破本土土绅权贵阶层对印尼贸易的垄断,造成了华人与原住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原住民将华人视为为殖民者服务的叛徒以及贪婪的经济剥削者。随着荷兰人迫使华人向原住民征收高额的赋税,原住民又无法与荷兰人直接沟通,他们的敌对情绪转向华人,华人在原住民心中的印象急转直下。

严格的社会等级分化并没有阻挡华人南迁

印尼,来自中国的移民人数仍持续增长。华人中亦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决心为年轻一代设立学校。荷兰人殖民者却忽视甚至拒绝给华人提供适宜的教育资源,于是华人社区自发联合成立了第一个华文学校性质的现代组织——中华会馆,以致力于在华人中教授和传播儒家学说。

中华会馆于 1900 年 3 月 17 日成立,在发展进程中逐渐成为“华人习俗和传统改革运动的中心”^{[2]11}。中华会馆举办的学校不仅有典型的中国特色,还兼具现代性。其举办的第一所学校于 1901 年在雅加达开设。这所学校在三个方面打破了传统:其一,经过几年的发展,学校使用的授课语言是普通话^①,而非闽南语或者来自中国南方的其他方言;其二,学校教授的课程源自现代西方教育课程,如同现代中国和日本学校所教授的课程,非旧式经典课程;其三,学校开设了女子班,并于 1928 年率先实施男女同校。若干年后,当中国的世俗民族主义开始谴责儒家思想及其教育时,华人学校也受到影响,不再教授儒家思想的课程。自 1906 年起,华校的督学几乎每年都要巡查荷属东印度地区中华会馆举办的学校。到 1908 年,荷属东印度群岛内已有 75 所华校(并非全部由中华会馆举办),约有 5 500 名学生。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教育部持续为中华会馆举办的学校提供教育方法、教材以及师资等方面的支持。

中华会馆与商会、书报社(专注于政治和革命的读书俱乐部)以及《新报》集团(土生华人经营的报社)致力于提升华人的整体社会地位,维系并加强华人对祖籍国的认同和归属感,在荷兰殖民时期掀起了具有亲华特征的华人民族主义运动,以认同中国为显著特点。

华人社团是一个异质和多元的群体,成员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和政治倾向。亲华并不是殖民时期华人社团中唯一的政治倾向。殖民时期华人群体分为两类:一类为新客华人(totok),一类为土生华人(peranakan)。新客指在中国出生,多数仍讲母语,政治倾向

为亲中国的华人。土生华人(侨生)则是在印尼当地出生的华人,能说当地语言,适应当地的生活习俗^{[3]10}。在新客和侨生群体内部仍有区别。中华会馆和《新报》集团本质上是亲华的土生华人的社团,中华会是一个亲荷兰的土生华人政治组织,印尼中华党是印尼民族主义运动的支持者、是亲印尼的土生华人组织。新客华人、商会、书报社以及演讲团体协会等皆支持中国革命运动的华人团体。

1942年,日本占据印尼。在日占时期,这些高度多样化的华人团体被迫组成一个综合大同盟。这一时期,日军对华人采取公开敌视的态度,把他们聚集在“华侨中会”同盟之下,试图在新客和土生华人群体之间制造分裂。当时日本和中国正处于交战状态,日本人为“华侨中会”同盟命名时,特意选取了“华侨”(海外华人)一词,而非“中华”(中国人)。

新客和土生华人两个群体并没因日本的对华政策而走向分裂,而是开始寻求相互合作。土生华人群体更倾向于与规模更大的新客华人团体结盟,而非与日本人结盟,更多地支持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自1942年起,就读于新客华人创办的华校的土生华人子女数量稳步增加,泛华运动团体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然而,新客和土生华人群体的结盟并未持续太久。1945年,随着日本占领的终结,把新客和土生华人群体联结起来的组织“华侨中会”也不复存在,新客和土生华人群体逐渐有了分裂的迹象。1945年印尼从荷兰殖民统治中获得独立后,印尼的华侨华人政策发生了变化。

二、印尼独立初期的华人组织

1945年8月17日,苏加诺宣布印尼独立,印尼走向宪政民主国家的道路,华人群体在公民身份问题上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在苏加诺总统的领导下,印尼这个年轻的民主国家开始察觉到华人的公民身份问题。在1949年的圆桌会议协定中,首次提出在印尼居住的中国人的公民身份问题。根据圆桌会议协定,在印尼出生的华裔青年自动获得印尼公民身份,亦可在

两年内自愿申请放弃印尼籍,选择中国籍而成为中国公民。据印尼司法部数据显示,当时约有39万在印尼出生的华裔青年选择放弃印尼籍。选择放弃印尼籍的多为新客华人群体,土生华人群体则选择加入印尼籍。由此,1949年圆桌会议协定再次把印尼华人分裂为两个类别:选择成为印尼公民的土生华人群体以及选择成为中国公民的新客华人群体。

圆桌会议协定有关华人公民身份问题的解决方案亦产生了一些问题。例如,部分在印尼出生的华裔青年,既不明确声明拒绝印尼国籍,也不选择中国作为其唯一国籍,这部分华裔就成为中国和印尼两个国家的合法公民。为进一步解决该问题,中印尼两国政府于1955年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4]。截至1962年1月,具有双重国籍身份的华裔选择印尼国籍的人数有所下降,原因在于除了法律和官僚体系的各项繁文缛节外,《双重国籍条约》还明确规定,华裔必须积极作出国籍选择。外侨公民身份的窘境也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例如,在政府政策扶持方面,印尼的外国公民(WNA)(此处指未获得印尼国籍的华侨)和原住民所享有的政策待遇具有明显区别,政府在拨款、信贷便利、进口和制造许可、批发和外汇兑换权等方面优先考虑原住民而非外国公民。

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查尔斯·科佩尔对此已有研究,他观察到印尼政府对外侨和华裔公民的不公正待遇日益严峻,在参政议政领域尤为明显。在选举活动中,华裔身份会影响其获得的选票数量,这成为当时华人政党最明显的弱点。当时的印尼华人民主党声明,亟需组建新的可以提名候选人或支持政党候选人以抵制种族歧视为纲领的社会组织。

在此背景下,印尼国籍协商会于1954年3月成立。为确保新组织获得最广泛的支持力量,印尼国籍协商会将目标定位为致力于成为一个“群众组织”,而不是成为一个政党。因此,该组织的目标清晰明确,在意识形态上不

结盟。由于其组织明确提出竭力提升全体公民权利、消除公民种族歧视,由此印尼国籍协商会在 1954 年至 1955 年间成为印尼所有种族融合团体中最具代表性的组织^[5]。

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尼国籍协商会逐渐脱离了组织章程中表述的意识形态不结盟主张,逐渐向印尼共产党意识形态靠拢。印尼国籍协商会的奋斗领域广泛,并不仅限于政治领域,由此源源不断地获得了更广泛的华人力量支持。它最初的功能是协助解决印尼公民身份问题,后来也协助制定服务印尼华人的经济政策,无论是外侨或是华裔公民,都能从中获益。此外,该组织在教育领域也很活跃,创办了数百所学校,包括在雅加达举办的一所大学,并在泗水开设分校。其中许多学校使用印尼语作为教学语言。

三、新秩序时期的华人组织

1965 年,印尼政局进入剧烈动荡时期,一切华人组织,包括印尼国籍协商会和华文学校皆被勒令关闭。同时,苏哈托对华人实施同化政策^②,禁止学校教授华文和弘扬中华文化,中印尼政治关系陷入僵局。同化政策的实施导致华人社会组织和华文学校关闭。

在 1965 年排华浪潮致使华文和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遭到禁止的背景下,印尼华人不得不遵守苏哈托政府施行的全面同化政策。华人不敢参与政治活动,只能在私人领域进行华人习俗和传统活动。在 1975 年至 1998 年间,所有华裔子女必须进入印尼文学校就读,华人与印尼同龄孩子共同学习印尼历史、政治和社会实践课程。由于在语言和文化上的限制,在苏哈托执政时期成长的华裔青年经常称自己为“在夹缝中成长的一代”或“被压制的一代”。他们无法如同父母辈那般自由进入华文学校就读,就连在其他正规学校学习华文的权利也被剥夺。

华人组织仅华人宗教协会和宗祠庙堂(骨灰屋)被允许保留合法地位。该时期宗教组织比过去任何一时期都活跃,孔教会便是其中最突出的华人宗教组织。1918 年,孔教会在梭

罗市成立,后在各地设立分会。1955 年 4 月 16 日,印尼各地孔教分会在梭罗市召开代表大会,成立印尼孔教总会。除孔教会外,还有名为三教会的华人宗教团体,该宗教团体旨在弘扬儒、道、佛三教思想。三教会后来也被称为“三教”。

1967 年 8 月,孔教总会在梭罗市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政府官员出席大会,苏哈托向大会致电祝贺。大会召开期间,印尼孔教会官方名称正式确定为“印尼孔教最高理事会”^③。但从 1978 年开始,苏哈托政府开始与孔教保持距离,认为孔教妨碍了印尼华人的完全同化进程。至 1978 年底,印尼内政部发布公告宣布仅承认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佛教和天主教是印尼五大合法宗教,否定孔教的合法地位。

孔教的合法地位被取缔后,政府开始大力扶持佛教。廖建裕指出,苏哈托政府认为佛教更符合印尼历史实际,佛教文化在印尼历史上曾盛极一时,印尼不仅是夏连特拉和室利佛逝两个佛教王国的所在地,也是世界最大的佛塔建筑——婆罗浮屠塔所在地。因而,政府决定将孔教、道教和佛教的礼拜场所改造成佛教寺庙或佛寺。1984 年 8 月,印尼佛教总会提议将所有孔庙改造为佛寺^④,三教会对此提出明确抗议,但抗议并未奏效,1990 年大部分孔庙已完成改造计划。

1998 年 5 月,苏哈托政权垮台,三教随之也进入了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时期。

四、后苏哈托时期的华人组织

印尼当前开放包容的政治环境与苏哈托执政时期截然不同。苏哈托执政时期政治氛围异常压抑,华文教育被限制和取缔,禁止在公共场所举办传播中华文化以及习俗的活动。1998 年“五月风暴”后,苏哈托政权垮台,印尼华人的处境得到了显著改善。1999 年 11 月至 2001 年 8 月,瓦希德出任印尼总统期间,他为取缔针对华人的一系列歧视政策做出了不懈努力。瓦希德总统通过签署 2000 年第 6 号总统指令,宣布废除苏哈托于 1967 年签署的

第14号总统指令(该指令将华人宗教仪式和习俗活动限制在私人领域),取而代之是允许公众庆祝农历新年。2001年8月至2004年9月^⑤,在梅加瓦蒂出任印尼总统期间,她宣布自2003年2月1日起^⑥,华人春节正式被确定为国家公共假日。

除华人春节得到印尼官方认可外,中华传统文化的实践活动也逐步得到恢复,如开设使用印尼语、英语和汉语作为授课语言的三语学校。1998年后,印尼华文报刊数量迅速增加,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华文报刊,例如《国际日报》《商报》《文汇报》,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报海外版》。1999年,还出现了华语新闻频道《美都新闻》,以及华语广播电台《地平线》,华文报刊呈百花齐放之态,华文和中华文化的媒体氛围更加开放包容。

此时的印尼社会也支持重建苏哈托时代被关闭和取缔的华人组织。首个重建的华人组织是印尼孔教最高理事会。印尼孔教最高理事会在苏哈托政权垮台后重新恢复,可使用印尼宗教事务部办公场所为大会场地。瓦希德总统在任时,宣布孔教是宗教组织,并承认孔教的存在^{[6]131}。2000年3月31日,瓦希德政府的内阁部长苏尔贾迪签署发布了一项公告,废除了只承认五种宗教的政府公告。正如廖建裕所指出的,这些行为表明在后苏哈托时期,国家已重新承认孔教的合法宗教地位。

佛教在苏哈托统治时期已获得合法性,由于政府对宗教的限制较为宽松,在苏哈托时代后期获得了较快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期,特别是在1998年以后,华人开始再次积极投身复兴华人寺庙的修建事业。他们积极参与大规模的、由全国性电台转播的如卫塞节的佛教活动。2007年,坐落于雅加达安佐尔的现代著名寺院印尼大丛山西禅寺在纪念佛教领袖生日庆典上,邀请尼泊尔嘉旺竹巴法王出席庆典活动。2023年底,印尼大丛山西禅寺与中国上海的玉佛寺联合举行庆典活动,以促进中印尼两国佛教文化友好交流。

对道教信徒而言,苏哈托政权终结后,可

以建立道教组织以满足信徒宗教活动需求。道教信徒人数相比佛教和孔教人数更少,一直以来是以三教会信徒身份出现。许多印尼道教信徒认为,道教教义与佛教教义、孔子学说有诸多相通之处,华人的许多传统习俗,如清明节烧纸祭祀等习俗源于道教。道教与佛教、孔教的主要区别在于,道家尊奉老子,佛教以佛陀为最高尊神,孔教以孔子学说为宗教指导思想。1998年印尼民主改革后,印尼道教总会建立。

在后苏哈托时期,除宗教协会得到复兴和重现生机外,许多华人组织也得到复兴和重建。据印尼伍氏宗亲总会主席伍瑞章介绍,印尼现有华人组织至少600多家,可分为以下几类^⑦。

(1)以印尼民族主义为宗旨建立的组织。这些组织以促进民族团结统一、引导印尼公民积极投身国家民族建设伟业为奋斗目标。这些组织态度开放,不仅华人可以参加,也欢迎友族参加。如:印尼华裔总会、印华心声、印尼民族团结统一研究机构、印尼民族民主论坛。

(2)具有政党性质的组织。如:印尼中华改革党、印尼大同党。

(3)以客家话、闽南话、广东话、潮州话等方言为基础建立的同乡会。

(4)以相同姓氏和血缘为基础建立的宗亲会。如:印尼黄氏宗亲会、印尼伍氏宗亲会、印尼林氏宗亲会、印尼陈氏宗亲会。

(5)以祖籍地或地缘关系为纽带建立的同乡会。如:印尼梅州会馆、福清会馆、大浦同乡会、南安会馆。

(6)以实现华族享有与印尼其他民族同等权利为宗旨建立的印尼全国性华人社团,认为华族享有同等权利的同时,也必须同其他民族一起,为印尼民主建设和国家安全事业作出积极贡献,并为之不懈奋斗。如印华百家姓协会。

(7)华文学校校友组织建立的校友会。如印尼巴中校友会、印尼浙江校友会、印尼华中校友会。这些校友会致力于促进和提升年长华人教师权益,积极筹建和推广奖学金,开办三

语学校,积极支持和促进文教事业的发展。

(8) 宗教协会。如:印尼孔教最高理事会、印尼佛教总会、印尼道教总会;也涌现出一些华人穆斯林宗教团体,如伊斯兰唯一信仰促进协会以及华人基督教组织,如印尼归正福音教会。

(9) 以相似兴趣和活动爱好而组建的团体。如唱诗班、体育俱乐部(乒乓球和羽毛球俱乐部居多)、中国象棋协会、阅读俱乐部、中华艺术鉴赏社等。

除上述所列组织外,还有以印尼相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如:由来自苏门答腊岛东部勿里洞地区的印尼华人组成的勿里洞同乡联谊会。由来自西加里曼丹地区(坤甸市和山口洋市)的华人组建的印尼赤道基金会,以及其成员由亚齐华人组成的繁荣亚齐基金会。

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协会以联合会的形式,从官方和民间两种渠道不断发挥着促进中印尼两国友好交流与合作的功能。其中,印尼广东社团联合总会是一个组织规范的联合会,于 2007 年 11 月 13 日在雅加达正式成立。印尼广东社团联合总会由 9 个社团组成:印尼客属联谊总会、广肇总会、潮州乡亲公会、海南联谊会、梅州会馆、蕉岭同乡会、惠州同乡会以及勿里洞同乡联谊会、大埔同乡会^{[7]22}。其中,印尼客属联谊总会、广肇总会、潮州乡亲公会是以方言为基础成立的社团,其共同祖籍地是广东省。海南联谊会之所以被纳入该联合会,是缘于海南省是从广东省划分而来。梅州会馆、蕉岭同乡会、惠州同乡会皆是以广东地区为据点,而勿里洞同乡联谊会则是以印尼境内客家方言流行地的华人组成。这些协会与全世界华人联合会具有相同性质^⑧,印尼广东社团联合总会与世界各地的广东联合会或协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比如,印尼广东社团联合总会就在雅加达成功举办过第五届“世粤联会”,“世粤联会”在全球每两年举办一次。

印尼福建社团联谊总会与印尼广东社团联合总会不同,它是组织形式相对松散的联合

会。印尼福建社团联谊总会,更具体而言是自然灾害援助福建同乡会,该协会成立于 2004 年底,旨在为亚齐海啸灾民筹集资金,其成员包括雅加达吉祥山基金会(福州同乡会)、雅加达福清公会、东山同乡会、兴安会馆、南安同乡联谊会、永春同乡联谊会、印尼安溪福利基金会、晋江同乡会、印尼东方音乐基金会、印尼同安互助基金会、雅加达龙岩同乡会、永定会馆、金门互助基金会以及林氏宗亲会^[5]。其中,福州市是福建省的省会城市,福清市和兴安(莆田的旧称)则位于福建省的东部。南安市、永春县、安溪县、晋江市、同安区(福建厦门市同安区)位于福建省的南部,龙岩、永定位于该省的西部。林氏宗亲会是以血缘和氏族为纽带建立的林姓华人宗亲会。苏哈托新秩序时期印尼华商巨富林绍良,是雅加达福清公会的积极倡议者和支持者,福清是其祖籍地。印尼福建社团联谊总会尚未正式成立时,雅加达福清公会下辖的 14 个社团的侨领就定期举行会晤、开展各项活动,除了向自然灾害受害者提供援助外,还积极修建学校,在华人新年等节庆活动期间向社会弱势群体分发生活必需品包。

从上述两个正式和非正式联合会的论述中可推断,各华人组织领导人及其成员可能存在重叠,他们可能同时属于不同的华人组织。印尼最大的华人组织——印华百家姓协会,有 93 个分支机构。据该协会首任总主席熊德怡介绍,他至少属于 5 个华人组织:印华百家姓协会、巴华中学校友会、印尼客属联谊总会、中国象棋协会、印尼梅州会馆。现任印尼孔教最高理事会主席陈清明情况相似,既是印尼孔教最高理事会主席,也担任印尼华裔总会秘书长。

据上述一些华人社团领导人介绍,也有一些以华人个人名义创立的社团,这些社团的职能不只涵盖华人社会的权益。如由印尼华裔律师沈爱玲女士创立的印尼祖国民族团结会,该协会的宗旨是为消除印尼社会对华族的歧视而奋斗,同时致力于消除印尼国内各种族间的歧

视。该协会在高声呼吁废除苏哈托新秩序政权时期华人歧视政策的运动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再如由印尼华裔总会创办者和首任总主席汪友山先生创立的印尼民族建设基金会, 作为一名印尼华裔商人, 汪友山先生强调印尼民族建设基金会并非一个典型的华人组织。据汪友山先生介绍, 该基金会是由汪氏家族设立的一个正式基金会, 其基金将用于促进和加强印尼民族建设进程。汪友山先生坦言: 印尼民族建设基金会“特别注重为印尼华人创造参与印尼国家与民族建设的机会, 鼓励华人与印尼友族同胞共同为国家和民族的建设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由此, 基金会为致力于研究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贡献的学者发表其学术成果提供大力支持。

华人社团成员往往由年长者组成, 他们的年龄一般是 50 至 70 岁左右, 也有 40 岁左右的成员, 但人数较少。几乎很少有 40 岁以下的华裔青年加入这些组织。华裔青年一般是在他们父母的敦促下才加入。例如, 潮州乡亲公会的 600 名成员中, 40 岁以下的成员占比不足 10%。

印尼华裔总会的领导者敏锐地意识到, 应说服华裔青年加入协会, 以不断增强和壮大协会队伍, 让协会长久地传承下去。他们同时也意识到华裔青年与其父母辈志趣和理想不同, 且华裔青年大多不掌握华语, 在政治文化认同上, 认为自己是印尼人。协会的奋斗宗旨是致力于消除种族歧视, 鼓励华人积极融入印尼主流社会, 但当前他们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 现在的华裔青年认为他们已获得印尼社会的接纳, 已融入了印尼社会。因此, 华裔青年认为这些侨领们过于严肃或观念迂腐陈旧, 经常重复那些不合时宜、与日常实践格格不入的问题。由此, 在经济发展领域具有较高威望的印尼华裔总会领导人尝试另辟蹊径, 在 2008 年初发起青年企业家协会倡议, 以吸引更多华裔青年的参加。印尼华裔总会前副主席许天堂指出, 青年企业家协会成功地吸引了 20 至 30 岁左右的华裔青年入会, 并较大程度

地激发了青年的参与热情。许天堂大力支持青年企业家协会的壮大发展, 同时他也郑重澄清, 不要误以为他会把印尼华裔总会引导成一个纯粹以商业为目标的组织, 他提醒协会成员要意识到肩上所负的社会责任, 扶持小型企业, 并制定帮助提升中下阶层群体增加收入的计划。另外, 华裔青年还应与印尼友族同胞分享华人的商业理念, 以便他们能够从中受到启发和获益, 这些努力将有助于改善印尼社会的排华观念。

五、结论

印尼的华人组织构成如同印尼的社会文化一般丰富且多样, 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华人组织一样, 它们规模大小各异: 有十几名成员组建的团体, 如中华艺术鉴赏社; 也有几千名会员的团体, 如印华百家姓协会和印尼华裔总会。从组织的聚集和功能上讲, 有功能较为单一的团体, 如唱诗班; 也有功能复杂多样的团体, 如印尼民族团结统一研究机构。就组织生命周期而言, 有临时组建的机构, 也有绵延了数世纪之久的方言协会。就社团繁荣程度来看, 有些是无固定活动地点且难以为继的小型团体, 如阅读俱乐部; 有些是拥有数千成员的大型组织, 其领导者往往是一方巨贾富商, 可以举办精心设计的年度宴会, 拥有极高的社会威望, 如印尼广东社团联合总会和印尼福建社团联谊总会。

这些华人组织经历了诸多起伏和变化。如前所述, 早期华人组织的功能主要是为新移民提供必要帮助, 并将操共同方言和拥有相同祖籍地的华人联结起来以互帮互助。随着华人在印尼的不断发展, 作为少数民族群体的华族肩负的使命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面临着更严峻的民族问题, 尤其是在政治动荡时期, 一再成为排华暴力活动的攻击对象。最近一次排华暴力事件为 1998 年的“五月风暴”, 大规模公开掠夺华人财产, 焚烧华人商店, 强奸华人妇女。陈玉兰博士指出, 这些暴力事件“促使华人参政意识觉醒, 华人对政府政策从顺从的态度转变为自我意识上更加积极主动参与政治活动, 试图通

过参政为华人争取合理的正当权益”^[8]683-703。

印尼华族倡议和动员建立的非政党和政治团体的华人社会组织,在华人组织获得重建和复兴后的 26 年间(1998—2024),在印尼国家需要时帮助减轻政府的负担,特别是在自然灾害发生后积极提供资金或其他援助。这些组织不仅为华人的教育事业尽心尽力,也为穆斯林儿童的教育事业提供大力支持。例如,潮州乡亲公会向西加里曼丹省的穆联学校捐建校舍。通过上述和许多其他华人积极参与印尼民族建设的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尽管这些华人组织是以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以及团结华人为目标而建立,但这些组织对印尼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和忠诚度是毋庸置疑的。

注释:

- ①印尼土生华人作家郭德怀(Kwee 1969)指出,普通话是中国的通用语言。使用普通话的想法来源于潘景赫先生,当时他领导了一场关于学校课程设置问题的辩论。在辩论中,他主张使用一门在爪哇较为陌生的方言。这种想法成为后来建立中华会馆的基础,一方面会馆有来自不同方言区的群体,比如闽南人、广东人、客家人和土生华人。若在学校里使用闽南语,广东人肯定会感到不公平。另一方面,普通话是所有省份和大量学者使用的官方语言。中国北方和中原地区说普通话的人几乎从不会过番到爪哇岛谋生。因此,普通话是一种相对中立的语言。基于这些坚定的理由,学校最终同意使用普通话。尽管许多福建人对此感受到了威胁,他们更希望看到学校使用自己族群的语言。渐渐地,他们的反对意见逐渐被忽略,所有中华会馆举办的学校都教授普通话(第 18-19 页)。
- ②苏哈托政权时期施行的最全面的同化政策之一是《解决华人问题的基本方针》。有关该政策的详尽信息以及限制华人宗教信仰、华人习俗的政策、关于外侨血统印尼公民的基本政策,请参阅陈玉兰(Mely G. Tan's, 1991)的会议论文:《社会文化视阈下华族在印尼历史上的角色与定位》,研讨会于 1990 年 7 月 13 日至 15 日在康奈尔大学与东南亚研究暑期学院联合举行。(《印尼华人在塑造现代印尼生活中的作用》)。
- ③关于印尼孔教最高理事会的历史发展,请参阅《印尼孔教最高理事会五十周年纪念:1955 年 4 月 16 日至

2005 年》一文,印尼孔教最高理事会 2005 年出版。

- ④Suryadinata, Leo. State and Minority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Indonesia: Recent Government Policy Towards Confucianism, Tridharma and Buddhism. In Tsuneo Ayabe (ed.), Nation-State, Identity and Religion in Southeast Asia (pp. 5-24). Singapore: 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 1998.
- ⑤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在 2004 年 9 月举行的全国选举获胜,成为印尼第六任总统。
- ⑥2000 年梅加瓦蒂政府宣布华人新年为选择性假日(即华人可在春节当天休假),正式宣布华人春节为全国法定节日是在 2003 年。
- ⑦这些华人组织的分类在伍瑞章先生即将付梓的书籍《伍瑞章的半个世纪》中作更详尽的论述。
- ⑧曾玲的《调整与转型:当代新加坡宗亲华人社团变迁》一文对论述华人协会全球化颇具启迪意义,载于李关键主编的《新国家的族群划分: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华人的案例》(第 85-121 页)。新加坡: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和新加坡亚洲研究协会。

参考文献:

- [1] KEMASANG, A R T. How Dutch Colonialism foreclosed a domestic Bourgeoisie in Java: The 1740 Chinese Massacres reappraised, [J]. Review, 1985, 9(1): 57-80.
- [2] KWEE, T H.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Movement in Indonesia (Lea E. Williams, Tans. Ed)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 [3] 丽佳. 印尼华人社团推进华文教育的实践研究 [D].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2012.
- [4] 钱健. 建国初毛泽东睦邻外交思想及其在东南亚的实践 [J]. 黑河学刊, 2009(3): 54-57.
- [5] 陶晶. 印尼华侨华人与原住民的融合问题研究 [D].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2010.
- [6] MURNIASARI(米拉) M. 印尼与中国关系中的印尼华人研究 [D]. 厦门: 厦门大学, 2017.
- [7] 杨宏云. 跨国主义视角的当代印尼华人认同新发展: 基于华人社团与社团领袖的考察 [J]. 八桂侨刊, 2015(4): 16-22.
- [8] TAN, M G. The Ethnic Chinese in Indonesia: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In F. Sleeman, AA. Sutarna. & A. Raiendra (eds.), Strugxling in Hope: A Tribute to the Rev. Dr. Eke Darmeputers, 1999.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Inspiration of Indonesian Chinese Organizations

Aimee Dawis (author)¹, LI Qihui (translator)²

(1.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choo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Jakarta, 10510, Indonesia;

2. Indonesia Research Institute, Fujian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Fuqing, Fujian 3503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ese organizations, covering informal small-scale organizations established during the precolonial period to large soci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Indonesian Chinese Clan Social Association and the Indone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after the "May Storm" in 1998. It emphasizes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Indonesia in the decade after the "May Storm". During this period, Chinese social organizations that were banned during the Suharto era were restored, and numerous new organizations with different functions and forms emerged, bringing about the reviva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Indonesia.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although Chinese organizations come in various forms and sizes, they are all established with common cultural values and the goal of uniting Chinese people, and have a rather high sense of identity and loyalty to Indonesia and its people.

Key words: Indonesia; Chinese organizations; Chinese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overseas Chinese; ethnic Chinese

(责任编辑: 仇国华)

(上接第 23 页)

Guid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ouguan Culture with Xi Jinping ' s Thought on Culture

HUANG Xiaoxin, HUANG Zhenghua

(School of Marxism,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17, China)

Abstract: Houguan culture is a unique regional culture in Fujian, with rich connotations of combining theory with its application, exploring and innovating, and embracing diversity. As the latest achievement of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Xi Jinping ' s cultural thought provides fundamental guidance and action guidelin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Houguan culture.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we should guide the construction of Houguan culture by Xi Jinping ' s thought on culture, strengthen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demonstr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ouguan culture. We should shoulder the mission of the times to push the development of Houguan culture and spread the spirit of Houguan culture to promote cultural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Key words: Xi Jinping ' s thought on culture; Houguan Culture; uphold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break new ground

(责任编辑: 杨文森)